



環島三十六到漁翁島—— 澎湖島嶼的海洋史

■ 林逸帆

澎湖群島原以「海中大洲」稱平湖 (phêng-ô)，到在文人眼中「環島三十六」，原本在歷史文獻中是他人「門戶」，但隨著時間與航線的發展，船隻的往來，澎湖以一個航線的補給站、指標點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。十五世紀以降，因為東亞海上航線的盛行，漳州灣為中心的人們航往各地；西洋人繞過印度洋北上，逐漸，「漁翁島」(Pescadores)之名登上世界舞臺。漁翁島位於「澎湖溝水」上，在「臺灣」之名還沒有出現前，「澎湖」或「漁翁島」是這條海峽上的代表，具有東亞航線的中心節點。澎湖也是十六世紀潮州、漳州海寇的補給聚集地，也是商人、漁人前往「東番」或呂宋群島時必經之路，同時，「漁翁島」、「東番」的歷史命運，開始緊密的聯結。從此，「漁翁島」或澎湖因為天然條件與地理位置，經濟、戰略與軍事地位展現於世界之上。

早期記載與名稱溯源：從平湖到澎湖

澎湖群島在「東番／臺灣」島之前，便已在歷史文獻中留下足跡。相較於「流球」與「毗舍耶」記載的不確定性，澎湖在南宋已明確以「平湖」(phêng-ô)或「澎湖」(phêh-ô)被記載。這些紀錄與南宋泉州知府汪大猷的經歷有關。

乾道七年(1171)，汪大猷(約1119-1200)上任泉州，4月「到郡遇事風生，不勞而辦，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，號平湖，忽為島夷號毗舍耶者奄至，盡刈所種。他日又登海岸殺略，禽四百餘人，殲其渠魁，餘分配諸郡。初則每遇南風，遣戍為備，更迭勞擾，公即其地，造屋二百間，遣將分屯，軍民皆以為便，不敢犯境。」¹汪大猷的親戚樓鑰，在他的著作〈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

汪公行狀〉中，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，這使得「平湖」這個地名因與「毗舍耶」的連結而載入史冊。同時，周必大(1126-1204)也在其著作中稱澎湖為「海中大洲號平湖」。²年代稍晚的真德秀(1178-1235)，則明確將其記為「澎湖」，他在「永寧寨」這裏提到「其地闕臨大海，直望東洋，一日一夜可至澎湖。澎湖之人，遇夜不敢舉煙，以為流求國望見，必來作過。」³這些記載都顯示了澎湖在當時的地理位置。

十三世紀二零年代，趙汝适(1170-1231)的《諸蕃志》與王象之的《輿地紀勝》也有相關記述。《諸蕃志》(1225，圖1)在「毗舍耶」條目中提到：「泉有海島，曰澎湖，隸晉江縣，與其國密適，煙火相望。」《輿地紀勝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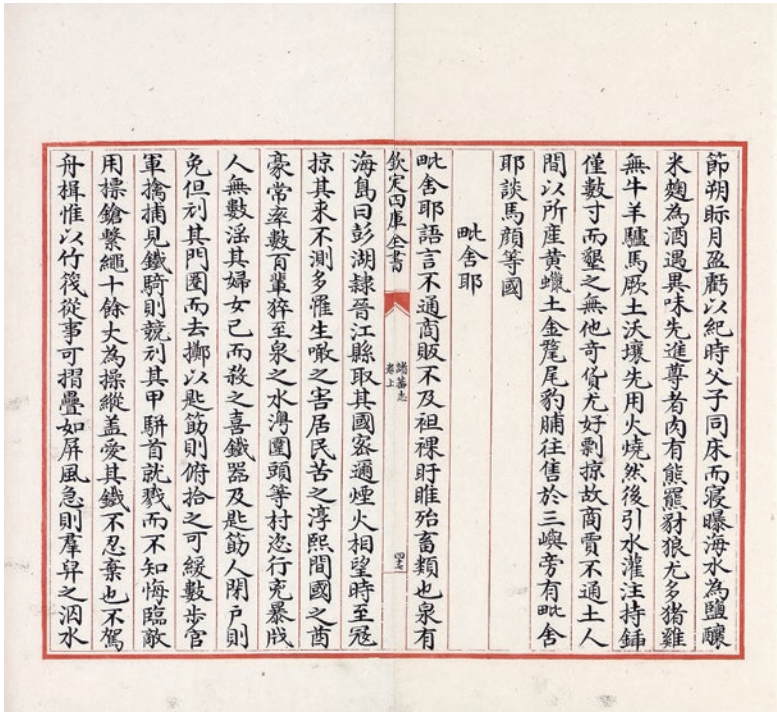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南宋 趙汝适 《諸蕃志》 毗舍耶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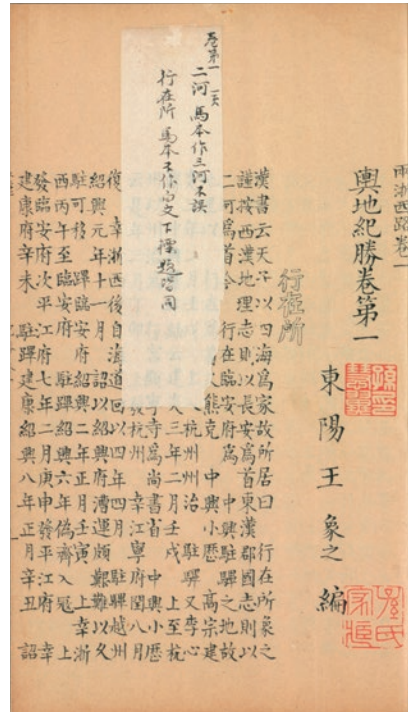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宋 王象之 《輿地紀勝》 舊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6601

(1227, 圖 2) 則以「環島三十六」來稱呼澎湖，並在該記述下補充說明：「自泉晉江東出海間，舟行三日抵澎湖嶼，在巨浸中。施肩吾詩云：腥臊海邊多鬼市，島夷居處無鄉里；黑皮年少學探珠，手把生犀照鹹水。」⁴

「三十六島」此後被方志與文獻持續作為澎湖群島的代稱之一，然而這並非實際的島嶼數量，而是用來概括其島嶼眾多。此外，儘管王象之引用的唐代施肩吾〈島夷行〉一詩，但多數研究認為並非描寫澎湖，卻因後世文獻不斷傳抄，意外地成為澎湖群島的意象之一。

元代紀錄：澎湖的物產與生活樣貌

元代汪大淵（1311-?）所撰的《島夷志略》（1349, 圖 3），對「澎湖」提供了更為直接且詳細的記載。作為一位親身遊歷海外且與泉州關係密切的航海者和作者，汪大淵延續了《輿地紀勝》「三十六島」（圖 4）的稱法，並對澎湖群島的地理與人文風貌進行了描繪：

島分三十有六，巨細相間，坡隴相望，乃有七澳居其間，各得其名。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。有草無木，土瘠不宜禾稻。泉人結茅為屋居之。氣候常暖，風俗朴野，人多眉壽。男女穿長布衫，繫以土布。煮海為鹽，釀秫為酒，採魚蝦螺蛤以佐食，熬牛糞以爨，魚膏為油。地產胡麻、綠豆。山羊之孳生，數萬為羣，家以烙毛刻角為記，晝夜不收，各遂其生育。工商興販，以樂其利。地隸泉州晉江縣。至元年間，立巡檢司，以週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，別無科差。

汪大淵的記載，不僅延續了對澎湖群島的形象描繪，更深入呈現了島上居民生活與經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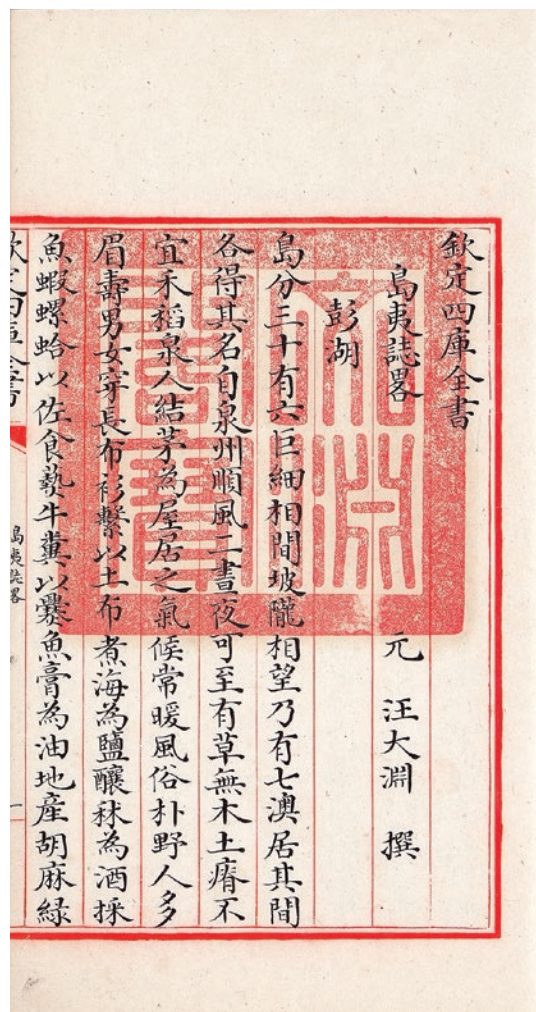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元 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澎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74

活動，為後世提供了澎湖島群的更具體的面貌。

航線網絡與澎湖的樞紐地位

澎湖因其在海上航行中作為重要航線節點及出泉或入泉的「門戶」之一，使得早期歷史事件都有其身影。

大明國時期（1368-1644），因為實施海禁後，泉州市舶司的熱度逐漸式微。然而，民間私下航海的盛行促使漳州港灣興起，使漳州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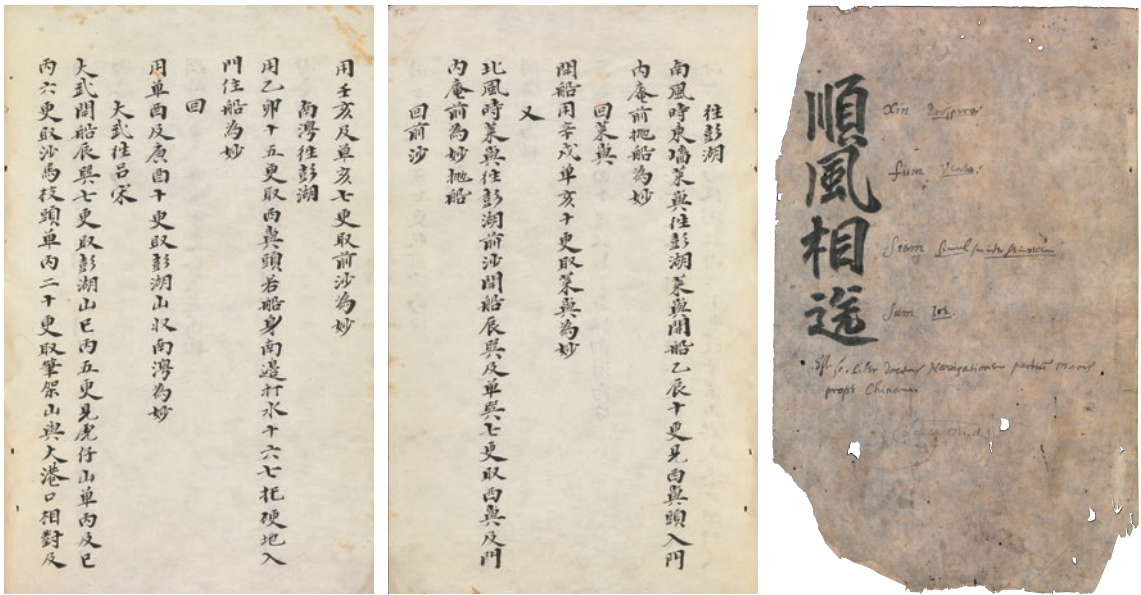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16 世紀 佚名《順風相送》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 Oxford, Bodleian Library MS.Laud Or.145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digital.bodleian.ox.ac.uk/objects/40aeb385-ef63-4f69-b11f-cccc2dc4723/> (CC-BY-NC 4.0)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5 日。



圖 6-1 17 世紀 佚名 塞爾登地圖 (Selden Map of China) 局部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 Oxford, Bodleian Library MS.Selden supra 105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digital.bodleian.ox.ac.uk/objects/58b9518f-d5ea-4cb3-aa15-f42640c50ef3/> (CC-BY-NC 4.0)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5 日。

正法》針路簿，被認為與《順風相送》有繼承體系關係。若分析《順風相送》針路簿，與澎湖有直接關係的航線包括：1. 東牆、萊嶼往澎湖：其中東牆為海壇、萊嶼在南日島附近，這條路線意指從海壇島、興化灣往澎湖的路線，並以「乙辰」（東東南）方向取西嶼，最終至門內庵前停船，且有返程針路；2. 南澳往澎湖：由南澳取西嶼頭，同樣有返程針路（圖5）；3. 太武往呂宋；4. 表上放洋；5. 泉州往彭家施蘭；6. 泉州往杉木。其中第3至第6種航線，皆是由漳州灣或泉州灣航往呂宋。

第3、4種航線（「太武往呂宋」、「表上放洋」）為漳州灣往來呂宋，經過澎湖至臺灣

西南沿海，並沿著菲律賓西岸航行。「太武往呂宋」的路線為太武開船後，辰巽（東南）方向取澎湖山，巳丙（東南南）方向看到虎仔山（打狗），再單丙（南）及巳丙（東南南）往「沙馬枝頭」（經筆者考證為沙尾崎頭，今貓鼻頭一帶）。「表上放洋」則是由「表」回浯嶼，經考證「表」應是呂宋島西部的白表仔，位於玳瑁港與頭巾礁中間一帶。順帶一提的是，白表仔往浯嶼有兩條路線：一為紅豆嶼直取浯嶼；二為經紅豆嶼往臺灣南部「沙馬歧頭」（沙尾崎頭），再取澎湖至浯嶼（圖6）。

第5、6種航線（「泉州往彭家施蘭」與「泉州往杉木」）皆有回程路線，但無需經澎湖。



圖 6-2 17 世紀 佚名 塞爾登地圖 局部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 Oxford, Bodleian Library MS.Selden supra 105

然而這兩條航線都以「長枝」作為起始開航點。前者由澎湖取臺灣西南再往南至呂宋島的傍家施蘭港（仁牙因、又稱林加延 Lingayen），後者則是由澎湖，不經臺灣，航往呂宋至杉木（蘇祿 sulu）。經考證，長枝（tiông-ki）港應為「祥芝」（siông-chi），其與澎湖、臺灣有航行歷史往來關係，在清代更是重要的對渡口。⁵

若將東亞地圖放大來看，澎湖與臺灣等島嶼，幾乎可作為東亞航線的中段，北接日本、朝鮮，南達菲律賓與印尼群島。若從中國沿海往呂宋，澎湖則為出航、入港的重要「指標點」之一。明人顧祖禹（1631-1692）稱：「澎湖溝水，分東西流：西達漳、泉，東達呂宋。」⁶這印證了澎湖的地理樞紐地位。

在葡萄牙人進入東亞、西班牙佔領呂宋後，東亞航線益發活躍，呂宋、漳州、泉州與日本間的航線更加重要。十六世紀中後葉，以漢人為主的倭寇橫掃東亞中北部，其中不乏漳州與潮州海寇的集結，這些發展使得該航線被官方文獻所紀錄，同時將澎湖與臺灣往東亞的歷史舞臺，向前推進了一大步。

海寇補給站與「東番」的浮現

十六世紀中葉，大明國皇帝正值交替之際，東南沿海海寇活動頻繁。明人曹學佺（1575-1646）在〈倭患始末〉中記錄：「萬曆元年（1573）潮賊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，海洋竄據澎湖，尋投東番，其黨林鳳……駕大夥倭船百餘隻乘風突至澎湖。」⁷潮州海寇林道乾、林鳳的活動，為臺灣歷史拉開新的一章。此時的澎湖群島，因其位於海峽中央的天然地理位置（即「澎湖溝水」），成為前往琉球群島、日本、呂宋或舊港、大泥等其他地區的必經路線，故扮演著海盜補給點或中繼點的重要角色，

這也解釋了海寇在此頻繁活躍的原因。

曹學佺所提到的「東番」這個名詞，是目前漢文書寫中，最早可確認指稱臺灣的記載。《明神宗實錄》在萬曆二年六月五日（1574年6月23日）紀錄福建巡撫劉堯誨（1522-1585）報：「廣賊諸良寶，總兵張元勳督兵誅剿，其逋賊林鳳鳴擁其黨，萬人東走。福建總兵胡守仁追逐之，因招漁民劉以道，諭東番合剿，遠遯。」（卷26）同年十月二十日（11月3日）並提到：「福建海賊林鳳，自澎湖逃往東番、魁港。」（卷30）⁸其後林鳳逃往呂宋，並佔據「玳瑁」（見圖6），則與上節所述航線不謀而合。

早於林鳳十年的海寇林道乾，在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記載：「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流寇林道乾橫行海洋，專殺土番，取膏血造船，擾害濱海。」「澎湖暗澳城明嘉靖間，都督俞大猷追流寇林道乾至此，因築焉。」⁹此史實在劉堯誨《督撫疏議》中亦可證實，其提到：「林鳳等向為道乾部落，各以知力互相羈縻，此其志亦欲為道乾耳。……率眾入閩，棲泊於澎湖之間……。」¹⁰這意味著林道乾、林鳳海寇集團一脈相承，林道乾逃至東南亞後，林鳳繼承其集團與路線，同樣以澎湖為據點，東往「小東」，西犯閩粵。有趣的是，劉堯誨在〈報海賊逃遯疏〉中提到，有烏嶼寮商民郭召、郭時等人，看見近日有賊船向東行往「小東夷地」，原本以澎湖為據點的林鳳，在廣東擄人丟在澎湖，但該三、四千人的團體並未打算久留澎湖，而逃往「小東」，即「謀為久住之計，乃不數日而逃之東夷者……」。

根據廣東俘虜稱：「各賊商說，此時暫往小東魁港避兵，劫取米糧……。」「小東」是外夷之地，且可知是所謂的「東番」，而魁



圖 7 1624 ~ 1625 Hendrick Adriaensz 福爾摩沙海峽地圖 (Chart of a Part of the Taiwan Strait With Xiamen bay, The Pescadore and The South-West Coast of Taiwan) 荷蘭國家檔案館 (Nationaal Archief) 藏 4. VEL 303 取自 Gommans, Jos and Diessen, Rob van, *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, VII: Oost Azie, Birma tot Japan. Voorburg: Atlas Maior, in collaboration with Koninklijk Nederlands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 Utrecht, Nationaal Archief 's-Gravenhage, URU- Explokaart, Universiteit Utrecht, Faculteit Geowetenschappen, 2010, 207.*

港 (今臺南北門) 則是海寇聚集地。此「小東」之名與十六世紀中葉鄭舜功《日本一鑑》中「圍頭徑取小東島，島即小琉球，彼云大惠國。」可進行對照並再研究。¹¹ 總之，在劉堯誨稱今臺灣為「東番」或「小東」之時，臺灣島上已有許多從事捕魚、經商的漢人，甚至有漢人通事與原住民交易並懂「番」語，而澎湖則是前往臺灣的必經之地 (圖 7 ~ 9)。



圖 8 1715 (印刷於 1726) 馮秉正 (Moyriac De Mailla) 福爾摩沙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圖 000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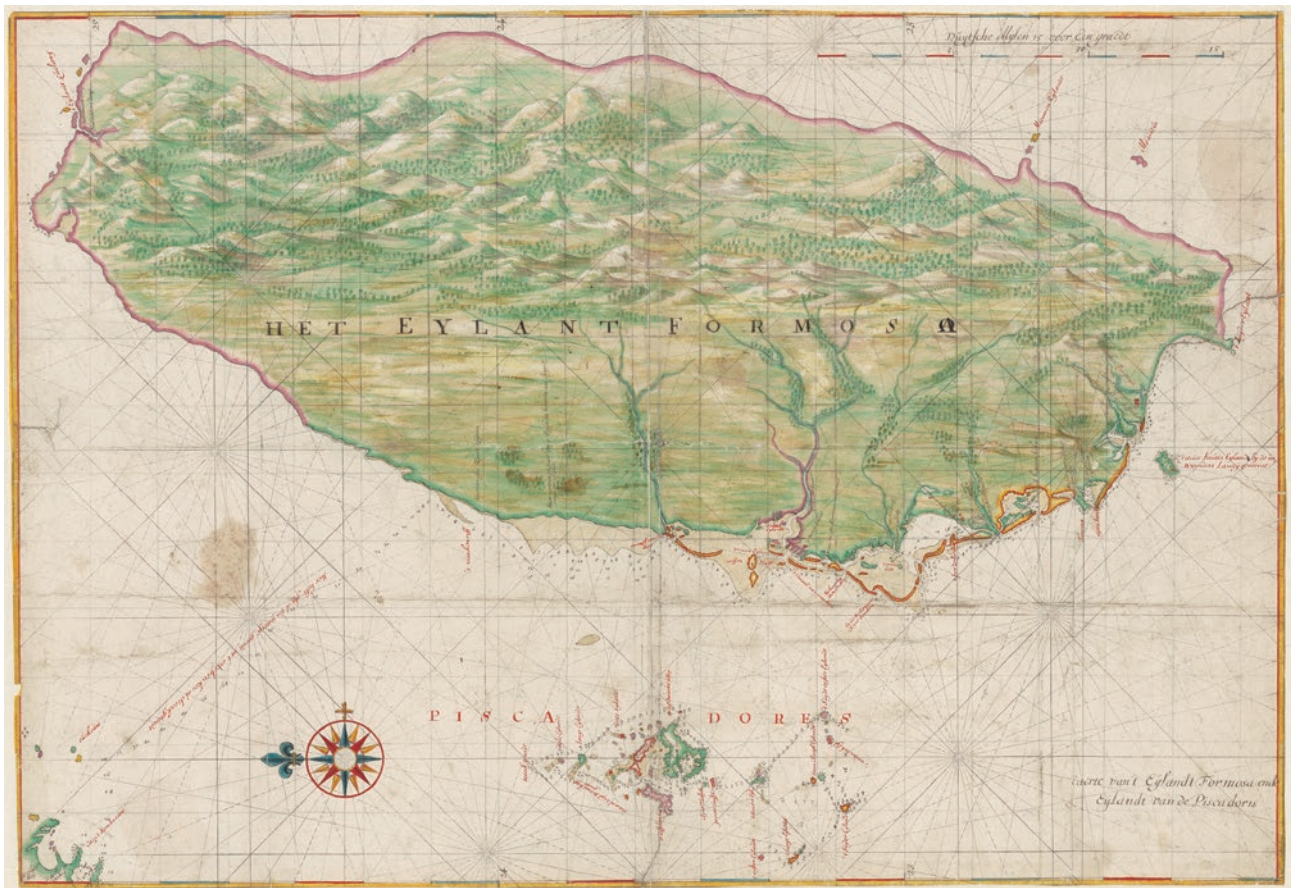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 1665 ~ 1670 Johannes Vingboons 福爾摩沙島與澎湖圖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NL-HaNA_4.VELH_619.52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pse.is/7xlc2k> (CC0)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5 日。

漁翁島的展現與航運中繼站的地位

十六世紀中葉以降，漁人、商人往來於東番與澎湖之間，在此歷史背景下，而有十七世紀初陳第〈東番記〉中，沿海文人或漢人對臺灣的理解與知識累積。東番夷地作為海外之地，除漢人外，其他地區的人也前來交易。再往西的澎湖群島，則具有福建海外「門戶」之警，若有外人（夷）至此，將引起大明官員的警惕，如 1604 年韋麻郎（Wijbrand van Waerwijck）事件就是一例（圖 10、11）。

荷蘭人至此，旨在挑戰葡萄牙人的貿易主

導權，並尋求與大明國貿易的可能性。葡萄牙人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即在澳門建立根據地，當葡萄牙、西班牙前往日本貿易時，澎湖就在他們的航線上，而有「漁翁低地島」（Os Baixos dos Pescadores）之名稱的出現，Pescadores 即漁人之意。該稱呼的記錄，來自林氏侯登（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, 1563-1611）。荷蘭人的林氏侯登曾經是葡萄牙船水手（圖 12），他收集了葡萄牙與西班牙的航海資訊，將其翻譯荷蘭文成冊《東印度旅程導覽》（*Itinerario*），該書為荷蘭人的東亞航行提供重要資訊（圖 13）。



圖 10 「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麻郎等」碑 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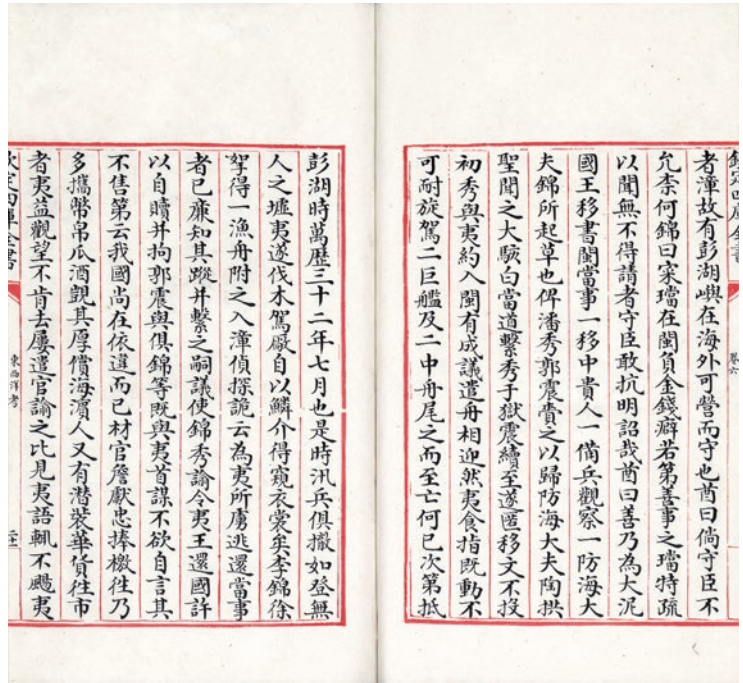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明 張燮撰《東西洋考》冊2卷6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2878



圖 12 17 世紀 林氏侯登畫像 取自 Wikimedia : <https://pse.is/7xlmp> (Public Domain), 檢索日期: 2025 年 7 月 21 日。



圖 13 1596 林氏侯登《東印度旅程導覽》 取自 Wikimedia : <https://pse.is/7xlsc> (Public Domain), 檢索日期: 2025 年 7 月 21 日。

書中記載澳門到日本的水路誌，提到經南澳後的安全水路，是廈門與漁翁島（A Ilha dos Pescadores）之間的海峽（'t Canael），即漢籍文獻所稱「澎湖溝水」；另一份西班牙航海誌，則提到澳門出發，經過漁翁低地島。這是漁翁島在澳門至日本航線中，被葡萄牙、西班牙所記錄，因為他們航行的是「澎湖溝水」，因此，應看到的是澎湖的西嶼這側，後來漁翁島甚至

擴展成為整個澎湖群島的稱呼。漁翁島的歷史記載，目前甚至早於「臺灣」島被確定稱為「Formosa 福爾摩沙」，這印證了澎湖在早期航海上的重要性。¹²

荷蘭東印度公司東印度總督庫恩（Jan Pieterszoon, 1587-1629）在 1622 年命令司令官雷爺兒生（Cornelis Reijersen）艦隊前往中國沿海，尋找適合地點貿易。同年 7 月，荷蘭艦隊抵達



圖 14-1 澎湖天后宮 作者攝



圖 14-2 澎湖城堡現址 作者攝於 2021 年 12 月 24 日



圖 15-1 1623 Gedaen Door Mosis Clas Comans van Amsterdam op hoop van verbeteringe 福州 (Fuzhou) 與漁翁島圖 局部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4. VEL 303. 取自 Gommans, Jos and Diessen, Rob van, *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, VII: Oost Azie, Birma tot Japan*. 208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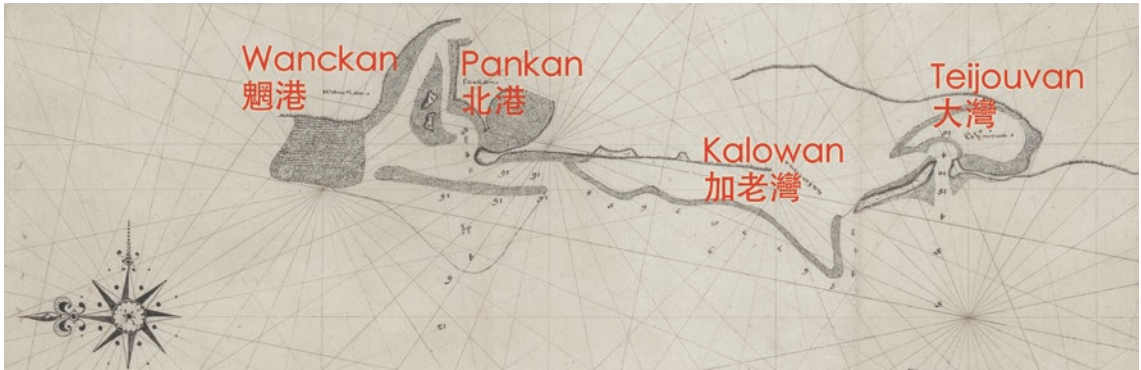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 1623 Copied from Moses Claesz Comans 大灣 (Taijuwan) 一帶港口圖 荷蘭國家檔案館藏 NL-HaNA_4_VEL_306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pse.is/7xlhem> (CC0)，檢索日期：2025年7月15日。

澎湖，發現漁翁島已有船隻停泊，如西嶼等地。荷蘭人隨即展開島嶼調查與居民接觸。他們與西嶼西澳的頭人 (overste) 會談，並與媽宮灣的娘媽宮廟祝、通事等人交流 (圖 14)。經過數日對西嶼、白沙島及媽宮一帶的調查，確認當地已有民居聚落 (圖 15)。



圖 15-2 1623 Gedaen Door Mosis Clas Comans van Amsterdam op hoop van verbeteringe 福州 (Fuzhou) 與漁翁島圖 局部

同月底，司令官雷爺兒生接受澎湖人的建議，轉往附近的臺灣本島 (Formosa) 西南沿海進行調查。包含大灣港 (Teijowan，清代史料稱臺灣，今多譯大員) 和打狗港 (Mackau，今高雄鼓山) 等 (圖 16)。然而，這些港口不符合船隻停靠要求，荷蘭人最終決定在澎湖建城。此舉引發大明官員的警覺，導致一連串交涉與對抗。最終，荷蘭人拆除在澎湖風櫃尾的城堡，撤退到臺灣本島，在大灣建立「荷蘭商館」，從此開啓了荷蘭在臺灣的統治時期。

儘管荷蘭人在臺灣港建立了商館，但東亞航線的公司船隻受限於季風、海流、風向與地形等自然條件，有時大型船隻 (schip) 不易停靠或進入臺灣港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船隻會選擇直接轉往澎湖，進行轉運或卸貨。

因此，目前多數研究認為澎湖是臺灣港的重要輔助港口或中繼站 (圖 17)。自 1630 年代起，澎湖作為中繼站的功能益發顯著。往來日本與東南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，會直接停靠澎湖進行貨物整理或卸貨，隨後再經由其他船隻將貨物轉運至臺灣港。¹³

澎湖作為東亞航線的重要中繼點，也是來臺灣港與漳州灣等地漢人船隻的重要補給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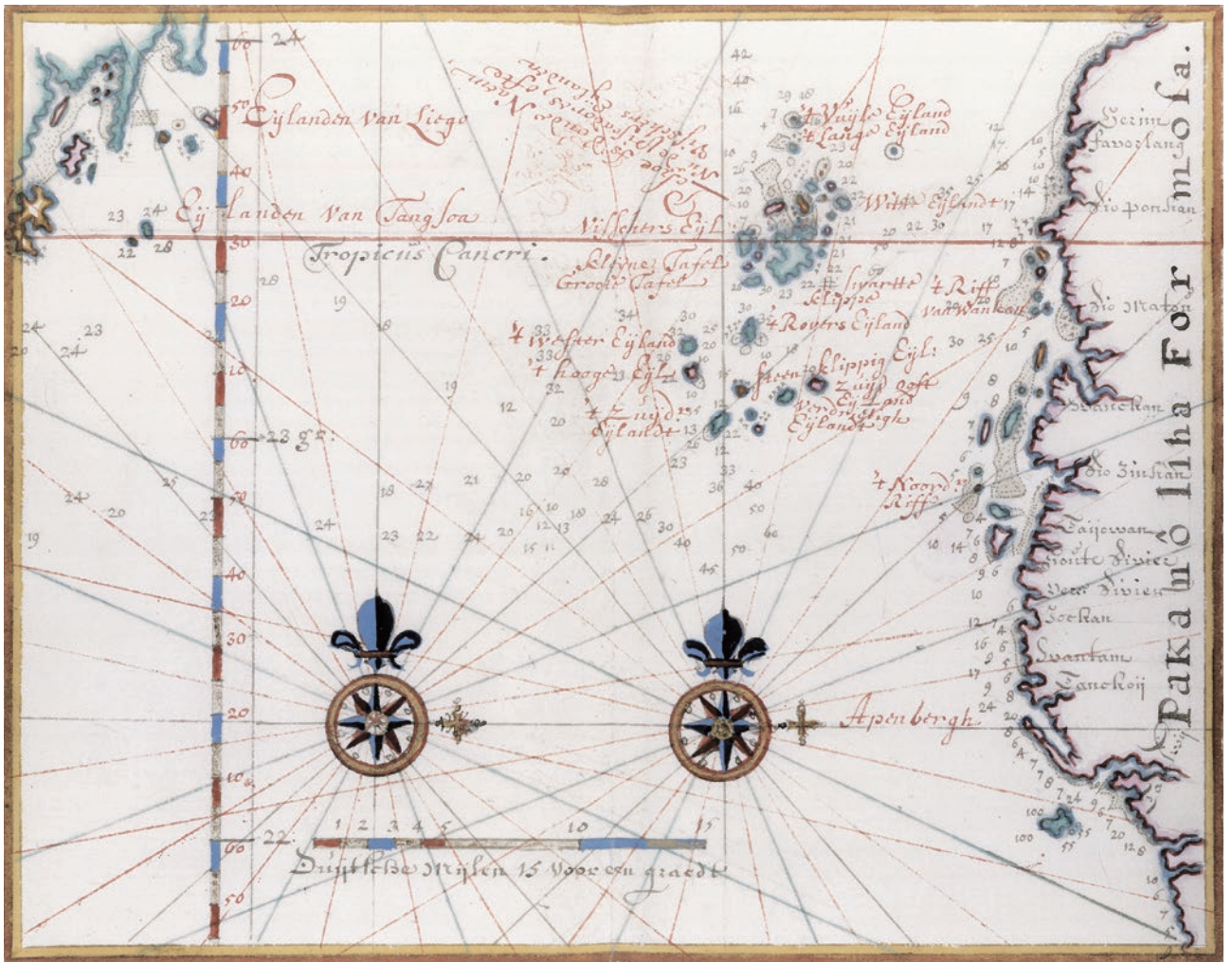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 1660 福爾摩沙海峽地圖 大英圖書館 (British Library) 藏 ADD. MS. 34.184 FOL. 95. 取自 Gommans, Jos and Diessen, Rob van, *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, VII: Oost Azie, Birma tot Japan. 207.*

此一歷史事實與結構自十六世紀已然形成，並隨時間推移，其政治與軍事戰略地位日益提升。

澎湖在地物產：西瓜與澎湖牛

清代文獻記：「澎人之飯，並無稻米甑飯，惟用薯乾煮粥而食，名曰薯米。爨無薪木，以牛糞乾炊爨，名曰牛柴。薯米、牛柴，名亦新穎可聽。」¹⁴ 番薯、牛在澎湖通判胡建偉 (1714-1774) 眼中，勉為其難稱之澎湖的特色，

但早在十四世紀，汪大淵就記載「牛柴」的情況，到了十八世紀，澎湖的物產相較過去更加多元，番薯等各項物產已是澎湖島上尋常可見之物。澎湖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，「稻麥黍稷菽之不全，僅以高粱、小米、地瓜、雜糧為種植之本。」(《澎湖紀略》卷8) 因為現有文獻缺乏，無法追尋十五、十六世紀的物產情況，但透過十七世紀的荷蘭檔案，以下提供一些澎湖物產發展的線索。

十七世紀荷蘭人的紀錄中，澎湖除了作為公司及其船隻的中繼站外，也有其他非公司（如漢商、漁人）的貨品從澎湖運到臺灣，透過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*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, Taiwan, 1629-1662*）的紀錄可以了解澎湖當時足以運送臺灣的物產。從澎湖到臺灣港的漢人船隻（非公司），船上的貨物，除了船上人員固定食用的鹽、米之外，最常見的是西瓜。這樣的記錄不同於傳統漢籍方志，通常瓜果類並非方志著重的焦點，然而，船隻的紀錄中，西瓜卻是常見物品。第一次記錄從澎湖運來西瓜是1635年7月24、25日。¹⁵ 此前，西瓜並非澎湖獨有貨品，中國沿海其他地區也有運來西瓜，這可能與西瓜的保存度高且能補充水分有關，得以在短途海運保存並食用。此後，西瓜成為澎湖運至臺灣的重要果物，6到9月為主要運銷期。隨著時間的發展，番薯和水產逐漸成為常見貨品。

水產（如魚蝦）等貨品的重要性不需多論，現今常見的番薯，其傳入澎湖或臺灣的來源則各有說法。十八世紀中葉《澎湖紀略》稱「番薯：俗名地瓜。閩書云：皮紫，味甘於芋。自明萬曆甲午歲荒，巡撫金學曾從外番勾種歸，教民種之，後乃蕃衍。何喬遠有番薯頌，序云：來自呂宋，可生熟食，亦可釀酒。今澎人遍地皆種，穫而切片晒乾，名曰薯米。其藤可飼羊牛、可供炊爨，利亦普矣哉。」（卷8）上述文獻指出番薯來自呂宋，十八世紀在澎湖已經很普遍，大致上與其他明代文獻記載相近。然而，稍早十七世紀的《海澄縣志》則提到：「甘藷，俗名番薯，以其種自東番攜來也。」十七世紀初〈東番記〉也有記載東番「無麥。蔬有蔥、有薑、有番薯、有蹲鴟，無他菜。」有番薯、芋頭與姜，因此在十六世紀或更早前就已經傳

入。綜合來看番薯的傳入路線，很可能是從呂宋，跟著船隻，沿著航線傳至臺灣或澎湖。

人類的食物構成中，除了蔬果、糧食之外，畜肉亦不可或缺。荷蘭人早已發現澎湖群島已有漢人飼養牛隻。根據1623年〈澎湖灣與城堡圖〉：「城外側，標有A、B之處，除非經小路，否則不容易走上來；這條小路原為牛路，必須部分打通及再行開路，但此刻仍無該路。」所謂「牛路」即牛隻所踐踏而成的路。此外，風櫃尾紅毛城至「I」點（今嵵裡一帶）之間，「可以飼養上百隻牛隻」；娘媽宮（Nioma-keng，原文稱小廟 *Sinees kerkien*）後有絕佳飼養牛隻之地（圖18）。這與明代文獻說的澎湖「地宜牧，牛羊散食山谷間。」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99）相符。1639年，荷蘭人已在臺灣本島赤崁地區飼養牛，因此，在討論臺灣牛的來源時，從澎湖運來的可能性或許高於從巴達維亞（今雅加達）運來。

《熱蘭遮城日誌》1643年8月11日開始，有牛從澎湖以船隻運到臺灣港的紀錄。此後，幾乎每年都有牛、羊、豬、雞從澎湖運往臺灣港的記錄。牛隻作為漢人傳統墾殖與交通工具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至於臺灣傳統是否有食用牛肉的習慣，則屬於另一個飲食文化議題。

牛肉則是荷蘭人主要食物來源之一。1654年，商務官赤崁郡守史黑德（*Frederick Schedel, ?-1657*）前往澎湖處理商務，臺灣長官卡薩（*Cornelis Caesar, 1609-1657*）交給他的備箋中，命令他們停留在澎湖時，需注意勿收購鹹肉（*soute vlees*），改採購買當地牛隻來屠宰，以求節約荷蘭肉品。¹⁶ 1661年8月鄭軍攻臺灣城期間，巴達維亞來援艦隊，就先去澎湖搶了「160頭牛、200頭羊、6頭豬。」¹⁷ 可見，澎湖居民飼養具有經濟價值的牛隻，而清代方志記：



圖 18-1 1623 Iohannes Vingboons, copied from Jan Jansen Visscher 澎湖灣與城堡圖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(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) 藏 Atlas Blaeu-Van Der Hem 41:11 取自 Gommans, Jos and Diessen, Rob van,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, VII: Oost Azie, Birma tot Japan. 211.

「牛有黃牛、水牛二種；澎湖無水牛，只有黃牛。」（《澎湖紀略》卷 8）因此，澎湖牛的品種可能為黃牛。¹⁸

在十七世紀，有西瓜、番薯、牛、羊、豬、雞等物產運送到臺灣，透過海運貨物的記錄，可以得知這是澎湖島上的物產，也是航行至臺灣島上需要的貨品，顯示海洋文化的另一種物產與飲食面貌。

歷史航線上的不朽印記

綜觀歷史，澎湖的重要性可從明人顧祖禹的描述得知：

其地環衍可二百餘里、三十六嶼之勝，蓋清漳、溫陵二郡之門戶。……嶼之正中曰娘宮嶼；從西嶼入，二十里曰茶盤、又十里為進嶼，即娘宮嶼矣。波平浪息，無溯奔激射之勢；其狀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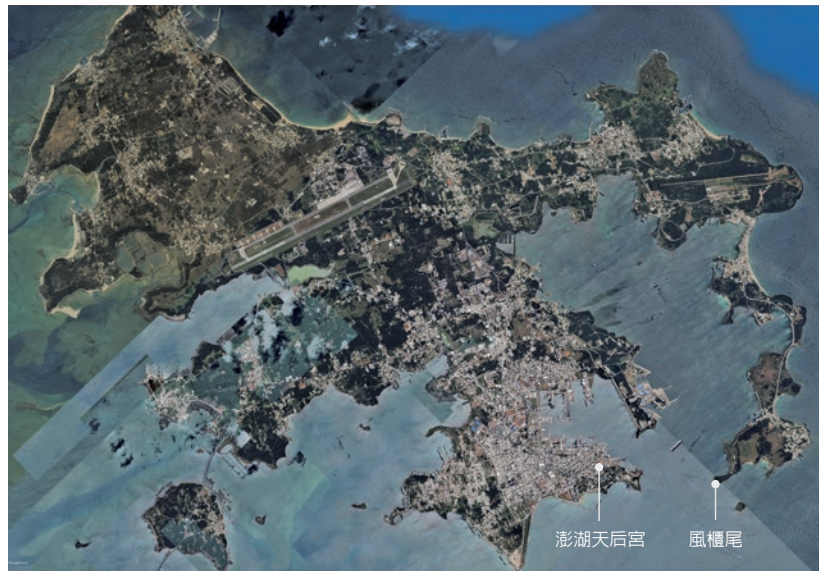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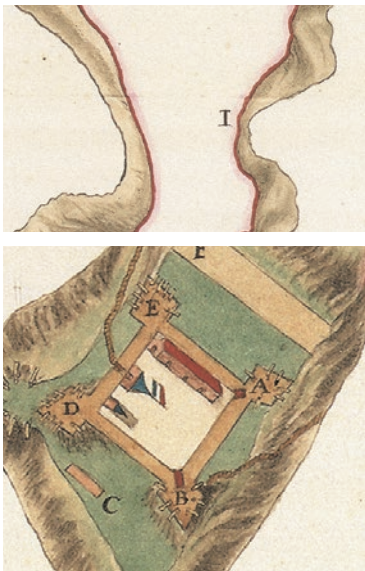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-2 左：〈澎湖灣與城堡圖〉局部 右：澎湖地圖 取自 Google Earth app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18 日。



圖 19 清 陳枚 《各省沿海口隘全圖》 局部 澎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867



圖 20 清 乾隆 不著撰人 臺灣地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



圖 21 清 乾隆 蔣元樞 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 澎湖西嶼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025

湖，因曰澎湖。湖面寬轉可里許，深穩可泊；遇南北風，我舟汎守皆頓其中。夷人往往窺伺，以為窟穴。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 99）

澎湖的名稱從平湖、到三十六島，其後，因有航線中繼站（點）的關鍵地理位置，而以「漁翁島」之名登上世界舞臺，至今日，則有「菊島」之雅名（圖 19～21）。澎湖的地位，從最初他

人的「門戶」，轉向為東亞航線的中心節點，兼具重要的戰略與軍事地位。因此，不論其歷經多少時間，換過多少名稱，增添他的色彩，其重要性仍不言可喻。

這片由眾多島嶼組成的「巨浸三十六島」，不僅是歷史上商貿往來、文化交流的橋樑，更是「澎湖溝水」上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。

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

註釋：

1. (南宋) 樓鑰，《攻媿集》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，故殿 010489），卷 88，〈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〉，頁 14。
2. (南宋) 周必大，〈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猷神道碑〉，《文忠集》，收入盛清沂主編，《臺灣省開闢資料彙編》（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72），卷 67，頁 63-65。
3. (南宋) 德秀，〈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〉，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，收入盛清沂主編，《臺灣省開闢資料彙編》，卷 8，頁 63-65。
4. (南宋) 王象之，《輿地紀勝》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藏清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刊本），卷 130，〈福建路泉州〉，頁 6，檢自《維基共享資源》<https://ppt.cc/ftX8Kx>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21 日）。
5. 本節考證參考林逸帆，〈臺灣「有字之史」：從十六世紀傳統東亞針路知識考察〉，《臺灣史學雜誌》，34 期（2023.6），頁 23-61。
6. (明清) 顧祖禹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選錄，收入董應舉撰，《崇相集選錄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 237 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7；1928 年原刊），卷 99，頁 131。
7. 曹學佺，〈倭患始末〉，《湘西紀行》（東京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），請求番號：集 45-0001，卷下，頁 43。
8.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，《明神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），卷 26，萬曆二年六月五日，頁 606-607；《明神宗實錄》，卷 30，萬曆二年十月二十日，頁數 731-732。
9. (清) 蔣毓英，《臺灣府志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7），頁 1、110。
10. (明) 劉堯誨，〈海賊突犯查參失事人員疏〉，《督撫疏議》（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），卷 1，頁 11。感謝翁佳音提供《督撫疏議》。
11. 翁佳音認為此處並非指臺灣而是太平島。
12. 《東印度旅程導覽》（*Itinerario*）又譯為《東印度水路誌》，翁佳音認為 1580 年代以前記錄的福爾摩沙島（Ilha Formosa）不一定指臺灣島，直到 1580 年代才能確實。翁佳音，〈「福爾摩沙」由來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·檔案館》https://archives.ith.sinica.edu.tw/collections_con.php?no=25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7 月 21 日）；翁佳音，〈近代初期的澎湖——追想澎湖初會紅毛番〉，收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、澎湖文化局編，《澎湖初會四百週年》（臺南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，2004），頁 44-56。
13. 林逸帆，〈近代初期東亞貿易網絡下的臺灣〉（臺北：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21.1），頁 125-141；翁佳音，〈澎湖紅毛城的歷史〉，《澎湖縣政府第 15 屆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》（澎湖：澎湖縣政府，2015），頁 114-127。
14. (清) 胡建偉纂輯，周憲文編輯，《澎湖紀略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·第 109 種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 年，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抄本），卷 7，頁 149。
15.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·第一冊》（臺南：臺南市政府，1999），頁 209。
16. 江樹生譯註，《熱蘭遮城日誌·第三冊》（臺南：臺南市政府，2003），頁 392。
17. 上直次郎記註，中村孝志校注，《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75），頁 311。
18. 林逸帆，〈近代初期東亞貿易網絡下的臺灣〉，頁 125-141、196-215；翁佳音，〈荷蘭時代：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〉（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29-145。